

“中国：现代性与传统”论丛

儒学的 历史文化 功能

——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
分子研究

陈明 著

学林出版社

儒学的 历史文化 功能

——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
分子研究

陈明 著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维劲

封面设计:姜 明 周艳梅

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

陈 明 著

学 林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天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插页 4 字数 270,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616-314-X/B·25

定价:21 元

“中国：现代性与传统”论丛



策划

逸人工作室



主持

倪为国 曹维劲



装帧

姜明 周艳梅

编者前言

自从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各个国家都毫无例外地面临着现代性的挑战,尤其是那些传统深厚的文明古国,因为,所谓现代性问题,就其本质来讲,即是由传统结构向现代社会转型而引出的种种难题,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群体的价值转换,个体身位的重新确认等等。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

近百年来的中国同样一直被现代性问题困扰。毫无疑问,它正是在这种与传统不能割断的历史延伸中艰难地向现代社会跋涉的。唯其如此,探究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与传统中国、现代性与中国传统便成了本世纪和下一世纪国人特别是学人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本论丛正是围绕着“中国:现代性与传统”这一主线展开各课题的研究与出版的,并特别注重原创性、当代性和批判性,以期通过这种努力,积累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提供对传

统的现代转换的建设性思路。

本论丛包括三个方面:基础理论研究,专题研究及专题论文选集。

1997年1月

序 一

余敦康

按照学术界相沿成习的看法，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儒学衰微、佛道兴起的时期，本书却特意选取这个时期来研究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凸显儒学的基本精神，似乎是不合常识，有悖说论，但是本书的理论上的创新之处和启发意义也恰恰表现在这里。魏晋南北朝的年代断限从曹丕称帝算起（公元 220 年）到陈朝灭亡（公元 589 年），历时近四个世纪。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东西方在这个时期普遍发生了民族大迁徙的事件，罗马帝国在日尔曼蛮族的攻击下全面崩溃，辉煌灿烂的古希腊罗马文化被扫荡得湮灭殆尽，成为一片废墟，而中国的政治上的统一局面虽然不复存在，长期饱受分裂战乱之苦，但是中国的文化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不仅在中国的南方发挥了“保江东以存中国之统”的功能，而且在中国的北方凭借自身的力量“以夏变夷”，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究竟是什么

什么样的文化力量创造了这种世界上的奇迹?是外来的佛教?是土生土长但以修炼成仙为目的的道教?还是与家族组织、农耕经济、孝弟人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儒学?问题的答案看来是昭然若揭的。但是,这个昭然若揭的答案却一直为学术界所无视,没有很好拈示出来。人们对这个时期的史实和思想作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值得称道的学术成果,唯独对于支撑这个苦难时期的精神的脊梁,以儒学为主导的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强大的凝聚力,缺乏应有的重视,真所谓明足以见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这种遗憾由来有自,涉及到“五四”以来人们对儒学以及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许多根本性的看法。为了克服这种遗憾,只局限于魏晋南北朝作断代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追本溯源,高屋建瓴,力求使自己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一个通盘的理解,对儒学的基本精神和本质内涵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这也就是说,只有在理论上进行一番艰苦的探索,大胆地突破学术界相沿成习的那些陈旧的看法,从根本上转换思路,才能把魏晋南北朝的断代史的研究打开一个新局面。不仅魏晋南北朝的研究情况是如此,包括先秦、两汉、隋唐、宋元明清在内的各个断代的研究情况也都存在着很大的遗憾,需要转换思路,重新诠释,打开新的局面。王夫之有云:“六经责我开生面”。事实上,以六经为依托的儒学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五四”以后,儒学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困境,现在是到了打开新局面的时候了。

我常常觉得,在中国的历史即将近入 21 世纪之际,学术界应当涌现出一批群星灿烂的大师级的人物来领导文化运动的新潮流。大师是从学徒起步的。但是,如果一个学徒缺乏

自觉的担待，缺乏深沉的文化使命感，不以大师作为自己奋力追求的目标，则终其一生只能做一个小打小闹的学术工匠。历史上的大师都出现在学术转型期。这种大师一方面是继往世之绝学，使自己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是致力于创造性的转化，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这两个方面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缺一不可。如果割断文化的根基，否定传统，拾外人之牙慧，立异以为高，固然成不了大师，反过来，如果像国粹派那样，以孤臣孽子之心抱残守缺，拒绝向现代转化，也是成不了大师的。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薪火相传，从来没有中断，这确乎是一个奇迹。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如果历代没有一批大师级人物弘扬主体意识，以斯文自任，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自觉地承担延续中国文化的使命，也许中国的文化早就断绝了。但是，为了做一个大师，谈何容易。金岳霖先生有一句名言，叫做“理有固然，势无必至”。所谓势，指的是客观条件。拿我个人来说，我接受的是转型期前期的教育，头脑里塞进一大堆陈旧的过时的观念，如今年过花甲，虽然锐意求新，但也像一个放开缠足布的女人，不是自然的天足了。因此，我寄希望于现在的年轻人。21世纪中国学术各个领域的大师级的人物是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从现在的一批年轻人群体中涌现出来的。

我是陈明的指导教师。本书是陈明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补充改写而成。从论文的选题、构思、写作、答辩直到全书的完成，我都直接参与其事。书中的一些论点、思路、看法当然也吸收了我的一部分探索的成果或偶发的感想，但是，书中为重新诠释儒学的精神及其历史文化功能所提供的理论框

架，却是陈明独立建构出来的。在审读论文时，我深深感到，年轻人优越于如我这样的老年人的地方，关键在于我由于受到许多条件限制，业已丧失了建构新的理论框架的能力，而年轻人则是初生之犊不畏虎，锐气锋芒没有被磨尽，自然本性没有被扭曲，只要立足于现实而回归于传统，方向找对，脚步站稳，加上严谨的学风，不懈的追求，是可以创造出更多的新意，把如我这样的老年人远远抛在后面的。当时论文答辩，我以指导教师的身份，特意抑制了我的一些不必要的感慨，写了一份例行公事的评阅书，抄录如下：

本书为解释儒学的精神及其历史文化功能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的建构是对前几年文化讨论的一种冷静的反思和积极的回应，有助于解开若干情绪上的扭结，澄清某些理论上的混乱，其启发意义与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首先着眼于三代社会之社会组织系统与家组织系统二元合一的基本结构，论述儒学的精神在于以自然形成的文化秩序规范一切，将政治运作及其过程置于文化价值理想的指导之下。接着作者以周秦之变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论述儒学在绵延两千多年的 state 与 society 二元分立且矛盾对抗的结构中，一直是执着于王道理想与三代情结进行整合，发挥批判调整的功能。尽管作者选取中古士族知识分子现象作为研究的个案，实际上这个理论框架在作者的心目中，是适用于儒学全体的。

以本书的中编、下编来看，作者运用这个理论

框架来解释儒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文化功能，是做得比较成功的。作者一反学术界通行的就思想论思想的写法，走了一条史学的道路，把儒学置于当时的历史变迁之中，夹叙夹议，给读者展示了一幅有声有色的动态的画面，解释了南北学风之差异与儒学精神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之不同的表现形式，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见解。读者尽可不必完全同意作者的若干具体的结论，但就其基本思路与宏观的视野而言，却是引人入胜，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作者的这个理论框架尚处于探索的过程中，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完善。总起来说，论文已达到博士学位水平，建议予以讨论通过。

我是欣赏这个理论框架的，所写的评语只代表我个人的私见。当时答辩会上就有许多前辈长者对这个理论框架提出过友好的质疑。但是陈明却浮躁紧张，狂妄自信，逐条辩驳，把友好的质疑一一抵挡开去，毫无古代儒雅君子的谦谦之风，充分显示了现代青年少不更事的特点。如果时间倒回去二三十年，陈明的这种性格是免不了要吃大苦头的。我为现代青年比我晚生二三十年感到庆幸。当时在座的前辈长者和我一样抱着善意的嘲笑容忍了陈明的这份激情，这份狂妄和自信。这也就意味着，现代青年是生活在一个稍许宽松的环境，可以多少保留一点狂者的气象，去建构理论框架，创立新说了。过去我曾引用过李贽的一句话，“学道全要英灵汉子”，认为缺少一般英灵之气的人是搞不了哲学的。但是，如果光凭一股英灵之气而不奋力向成熟之境迈进，始终停留在幼稚阶段，

也搞不出一套哲学。陈明现在正致力于隋唐儒学的研究，接着要去研究宋元明清，也许在花费了数十年的功夫之后，他的这个理论框架才算真正站住脚。即令如此，也有可能被人们所推翻。如果到了 20 世纪，中国的学术界能够建构出一个又一个理论框架，创立出一个又一个的新说，真正再现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百家争鸣，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有了希望了。

1993 年 8 月

于北京

序 二

陈 来

源生于中国大陆的儒家文化，经过二千余年的发展，已历史地形成整个东亚地区的文化要素，以至学术界曾有所谓“儒教文化圈”的提法。近百年来，儒家文化圈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两种明显不同的文化走向：一方面，在中国大陆，对儒家文化的猛烈批判与全面否定，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运动的主流。另一方面，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现实地利用了儒家文化的传统，使之对现代化与现代社会仍能作出积极的贡献。如果不限于儒家文化，而从“传统”的普遍意义来看，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无不显示出传统的珍视的意愿；相比之下，20世纪中国人的重要特征，即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传统进行彻底的文化革命，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在东亚地区现代化的实践中，显然是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经验。

就文化观念本身来看,“五四”以来文化激进主义的全盘反传统思潮,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理论的偏差或误区。这就是:以科学和民主为划分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标准;以外在功能判别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以封建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来了解儒学的文化特性,这三个论点构成了20世纪反儒思潮的主旋律。但是,道德、宗教、审美诸价值是不可能由科学和民主来评判的,从而,在科学和民主的范式之下根本无法容纳各种人文或宗教的文化价值。无论是柏拉图还是莎士比亚,西方文化最优秀的文学与思想作品也不具有富国强兵与经济现代化的功能,由此可知,儒释道法与唐宋诗词的价值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在经济—军事的功能座标中加以衡量。诚然,儒学的某些部分确实在历史上曾被意识形态化或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但儒学提出的社会的价值理想,自我修养与人格美德的学说,关于伦理准则的普遍原理,以及人生意义的深度思考等根本不是“君为臣纲”一类的教条所能代表。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其着眼点和基础并不是国家,而在个人、家庭和社会。从方法上说,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是把思想文化理解为对应、反映、服务于特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这种理解中,文化只是每一时期制度现实的反映,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连续性无法得到说明,而事实上,儒家文化的连续发展不仅是知识阶层自觉传承活动的结果,而且在两千余年的积流中,业已成为中华民族连绵不绝的文化生命。

在20世纪行将走过的时候,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以来有识之士不断检讨和反省五四遗产的偏失,重新认识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了解儒学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作用,及其在

现代社会的意义。尽管把儒学视为封建遗毒的思想流风仍相当广泛地存在，但的确可以看到正在发展着一种变化，即曾支配和纠缠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文化激进主义日益失去其说服力。这不仅标志着当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成熟，也为儒学消化百年来的批判而开创新的发展，带来了“贞下起元”的契机。

当然，儒学的中兴或重建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在学术层面上，为了彻底克治 20 世纪的文化病症，必须以坚实的和富有思想的学术工作为基础。就重新认识儒学而言，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的学术工作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历史地追述儒家发生、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分析儒学在中国文化体系的地位与角色，把握儒学在历史上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另一方面是阐发儒家价值体系的超越具体时代的意义，清理反儒学思想的理据和观念，探索儒学现代转化的可能性。前者可以说重在理解儒学的历史的合理性，后者可以说重在阐发儒学的价值的合理性。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是相辅相成，不可替代的。

陈明博士的《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一书是根据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去夏有幸先睹全书，为之赞叹不已。本书研究由以切入的视角，把握问题和处理材料的方法、线索，其中所体现的历史、哲学、文化的意识与理解，以及成熟、出色的表述，足以表明这部著作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思想学术水平，是近年来中国哲学史专业的博士论文中的出类拔萃者，也是新一代学者重新认识儒学价值的工作的一个代表。一部成功的博士论文，需要全面的占有历史材料，同样重要的是，要有新的方法与观念的突破，有前人所未发的见解，在这些方

面，该论文都有创获。

全书借助政治学分析的方法，从国家组织系统与社会组织系统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矛盾统一关联，考察了儒家思想植根的社会基础及其历史文化功能。作者特别强调，儒学植根于社会组织系统而不是国家组织系统，儒学既为社会生活、政治运作及个体安身立命确定了价值标准，又对社会整合、社会均衡有重大作用，这些见解是很深刻的。书中特别将理论分析的框架运用于中古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个案研究，其中对北朝经学士族如何以儒学文化的价值原则通过家族人伦与典章制度制约、统摄胡族统治的政治活动描述，尤见精彩。

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作者要我写几句话，感其雅意，略就重新认识儒学的问题简叙之如上。我希望，将有更多的人通过阅读此书，感发兴趣，参加到重新认识儒学的工作中来。

1993年7月23日

于北京大学

前 言

思想史的研究在近代有二大分野。其一侧重思想系统内诸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旨在探讨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与规律；另一则关注思想观念与人类行为间的互动关系，从中寻找文化的价值意义。这两种思路都有自己的方法论前提。前者把人理解为认知主体，心灵只是观照现实世界的白板或镜子，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不过是对真的追求；后者则把认知活动视为人的生活整体之一部分，而人是有着自己意志愿望的主体性存在，因此，思想史上的诸概念范畴并不只被视为捕捉世界之网罟上的纽结，认为它还凝结着思想者对世界的感受，反映了他们的价值需要。大致说来，前一种研究方法可以划入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古典哲学的范畴，后一种则与现代哲学思潮相契合。当代美国史学理论家 G. G. Iggers 在其《欧洲史学新方向》中写道，“在尼采、斯宾格勒、G. 巴什